

人口轉變的「中國大陸模式」

• 程超澤

當代中國大陸人口的轉變過程，不僅異於西歐各國的經驗模式，也異於實行「家庭生育計劃」取得成效的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情形。它的人口轉變過程，既與自身人口發展的過程特徵有異，又與其人口發展的文化背景有關，遠非一般人口轉變理論所能說明和詮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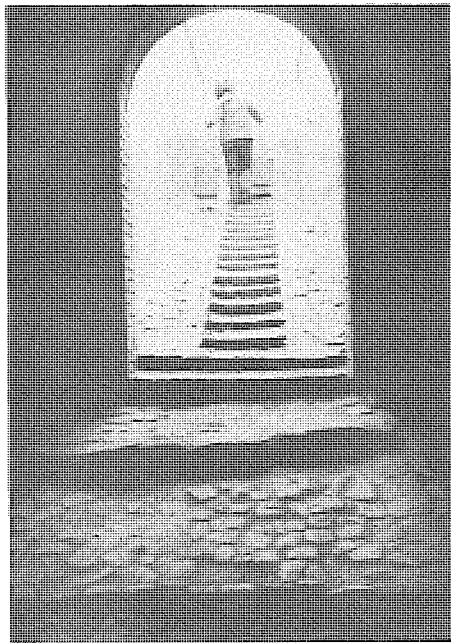
人口轉變的傳統模式

人口轉變理論的早期研究是在對西歐各國人口發展過程的描述基礎上進行的，這一研究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被美國人口學家諾特斯坦首次應用於發展中國家。爾後，人口轉變的研究方興未艾，成為一熱門課題。對人口轉變階段的劃分各家有各種不同的劃分，最通常使用的是「三段式」：「高高低」、「高低高」、「低低低」（三者依次代表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三種類型的轉變又大致可用來描述人類發展過程中的三個歷史階

段，階段間的進化被視為「人口再生產類型轉變」，或稱「人口轉變」。由於每一次「人口轉變」具有特殊意義，通常又將轉變過程稱為「人口革命」。描述人口轉變過程的觀點和模式，被稱為「人口轉變理論」^①。這一理論的內容是不斷被修正、補充以求發展的。

人口轉變論認為，現代化是人口轉變的先決條件，即西歐各國的人口轉變是在經濟「起飛」(the take-off)之後開始的^②，而出生率的下降與死亡率的下降之間經歷了一個「時滯」(time-lag)過程。隨着工業化的深入，城市化、現代化的不斷發展，死亡率開始率先下降，出生率沒有多大變動，形成了人口加速增長的早期擴張階段。當死亡率繼續趨於下降的同時，出生率也開始下降，一般是死亡率在早期擴張開始下降後經過大致50年的「時滯」。

隨着人口轉變理論的日臻完善，其缺陷也愈益明顯。柯克斯曾歸納了四條批評意見：一、人口轉變論不能



人口理論的三階段論，能否應用在中國？

解釋為何一個國家出生率下降開始較遲、後來卻很快；二、所有生育率的下降，在時間上的複雜性僅用一個模式來解釋顯然是不夠的；三、人口轉變論沒有考慮社會不同階層在生育率下降中的不同類型；四、事實上，轉變結束後的人口遠非穩定，有時呈回升或繼續下降趨勢^③。這一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實踐中，同樣被經驗證實是不適用的，因為生育率由高到低的轉變是在社會經濟不發達的情況下發生的。後來的研究表明，就是一些西方國家人口轉變軌迹也沒有遵循這一模式，如死亡率總是先於出生率下降的結論在法國則表明為同時下降^④。最後，這一理論沒有給定數量限界，出生率與死亡率變動的高低因而是不能確定的、任意的^⑤。

中國大陸人口轉變的獨特模式

人口轉變理論在大陸的應用，通常採用了諾特斯坦的「三段式」進行描

述性分析^⑥。這一分析把1949年以前大陸人口定為「高高低」階段，1949年後到70年代初為「高低高」階段，70年代以來為「三低」階段^⑦。但是，這種簡單的歸結顯然失之偏頗，理由是：首先，將1949年以前劃為「高高低」階段是帶着濃厚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色彩的，為了向世人證明大陸人口轉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產物，從而擯棄了人口轉變內在的「自然歷史」屬性。事實上，以死亡率率先下降為特徵的人口早期擴張早在本世紀初已開始，大概可以追溯到清朝初葉。如1741年中國人口為1.43億，到1851年已增至4.32億^⑧。如此迅速的人口增長，從人口學要素來看，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死亡率與出生率的高低不同。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死亡率比以前下降了。據載，1917-1918年廣東潮州的死亡率為34%，1923年間河北鹽山的死亡率為37.1%，1924年河南、山西、安徽、江蘇四省的平均死亡率為27.6%。又據載，1938年全國平均死亡率為28.2%^⑨。

清初以後社會內部安定，對外貿易擴大，運輸工具有所改進，尤為重要的是，食糧的供應因甜薯等作物的引進，「增加了糧食產量，預防了荒歉年份的飢饉困窘，並且加強了人們對疾病的抵抗力，帶來降低嬰兒死亡率的肯定結果，因此使大部分女嬰能夠活下來生育子女」^⑩。雖然這只是一種推測，早期擴張乃至過渡階段人口轉變在1949年共產黨執政開始以前，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把1949年到70年代初劃為「高低高」階段，籠統地把50年代和60年代的人口轉變等同起來，是值得商榷的。固然，這兩個時期都屬於「高低高」，但是50年代死亡率由20%下

將1949年以前劃為「高高低」階段是帶着濃厚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色彩的，為了向世人證明大陸人口轉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產物，從而擯棄了人口轉變內在的「自然歷史」屬性。

降至10%左右，而60年代卻維持在10%以下，這顯然具有不同意義，前者為人口增長的加速過程階段，後者是勻高速過程階段。

最後，將70年代以來歸結為「低低低」階段，將無法理解何以到了80年代出生率又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回升和波動現象，這種波動，既非人口轉變的完成階段，又非向「低低低」階段的過渡。

用傳統「三段式」來硬套大陸人口轉變，並沒有準確地刻劃出這種轉變的基本特徵，其所作的趨勢性描述頗為模糊，從而對人口轉變原因和後果分析也難以令人信服。中國大陸人口轉變異於其他諸如西歐、日本模式，可稱為獨特的「中國大陸模式」。

從圖表1中看，大陸人口轉變五階段是顯而易見的。第一階段，從1949年建國以前至1959年，死亡率完成由高到低的轉變，而出生率居高不下，僅在後期伴有下降趨向。第二階段(1959-1961)是大陸一段非正常時

期，出生率猛跌，死亡率猛升。這一時期發生了「大躍進」事件和嗣後的三年自然災害。人口轉變過程被大大地扭曲。第三階段(1961-1971)，死亡率迅速返回低水平，且比前更低，出生率始終高於30‰。這一時期人口增長應視為勻高速增長，即低死亡率和高出生率的持續。第四階段(1971-1979)，死亡率幾乎不變，出生率持續大幅度下降。這一階段含有「諾特斯坦模式」過渡階段的特徵，即出生率持續下降，但又迴同於諾特斯坦的「在一定死亡率水平上下降」模式，是在死亡率維持極低水平的基礎上的出生率下降。第五階段(1980-1990)，死亡率仍保持不變，出生率出現先回升後下降再回升現象，波動較為劇烈。從人口增長來看，可視作波動增長過程，為傳統模式所無法說明。

在上面分析的中國大陸人口轉變經歷的五階段中，第二階段是由特定歷史社會原因造成的非常規階段。如果加以舍象，我們已可清楚地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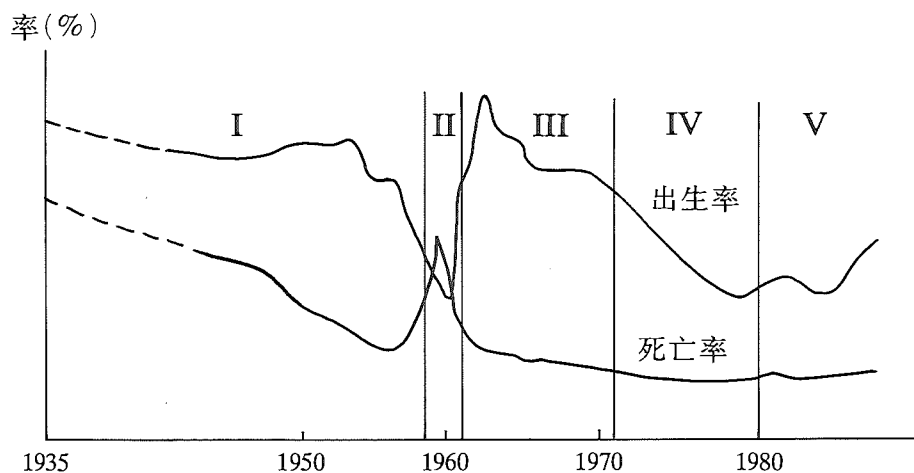


圖1 中國人口轉變的經驗歷程

資料來源：建國前資料引自《中國人口地理·上》；1949-1985年資料引自《中國統計年鑒》；1986、1987年資料引自《人民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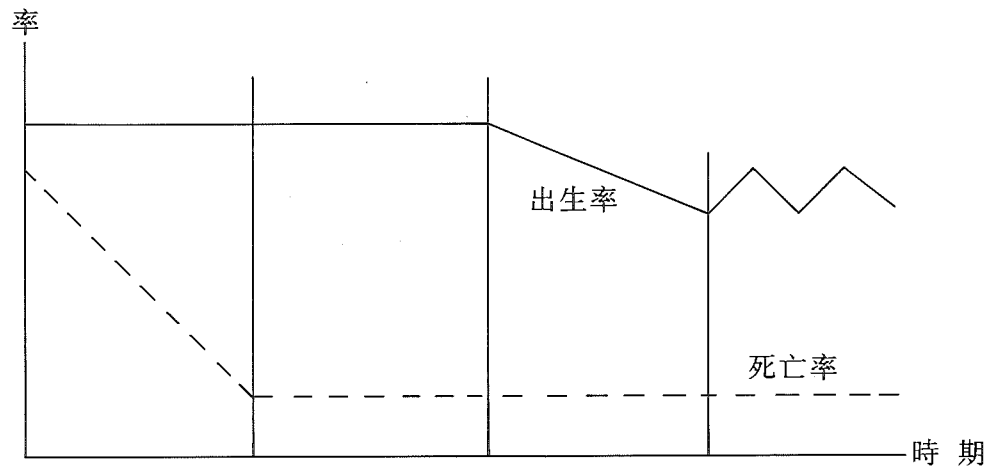


圖2 中國人口轉變模式

「中國大陸模式」的概貌(見圖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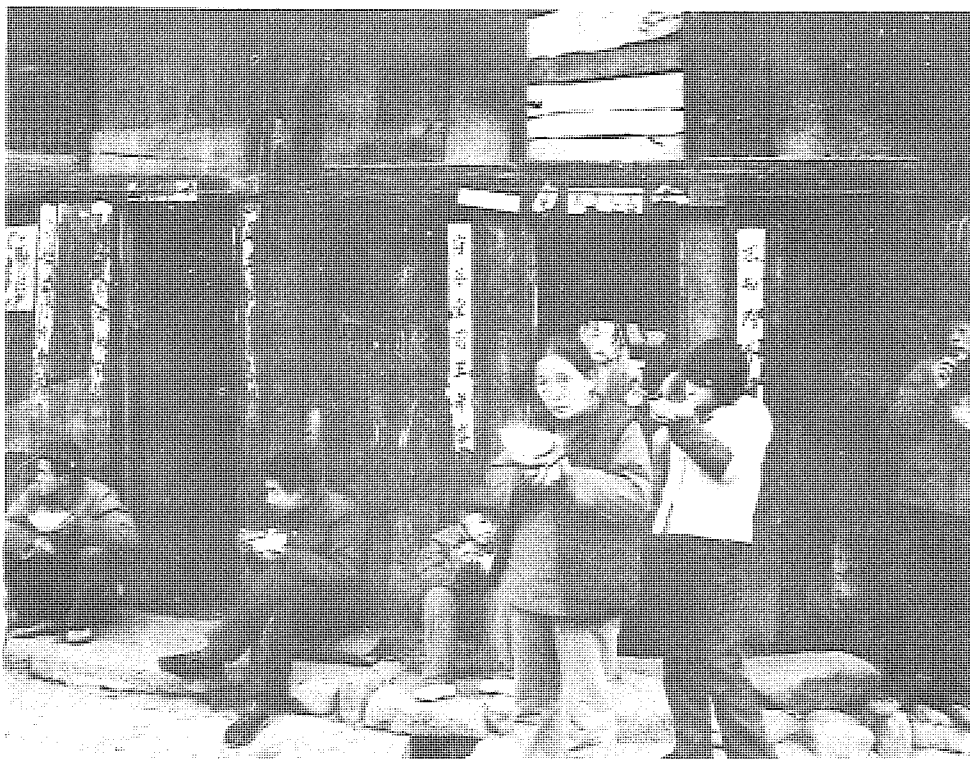
從圖2可見，第一階段為高出生率和持續下降的死亡率，稱為加速增長階段；第二階段是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稱為勻速增長階段；第三階段為持續下降的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稱為減速增長階段；第四階段為波動的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稱為波動增長階段。大陸人口轉變模式的獨特性不僅在於死亡率在短時期內下降至極低水平，因而形成了第一、二階段的獨特歷程，而且在於出生率是在滯後死亡率下降以後很長期間的下降，其速度之快、幅度之大極為引人注目，是迄今為止已完成人口轉變的西方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所沒有的。這種下降又在一定時期後進入波動和返升狀態，因而形成了第三、四階段的獨特歷程。

大陸人口轉變模式形成的因素分析

如前所述，由於死亡率在短時期內下降至極低水平，從而形成中國大

陸第一、二階段的獨特人口轉變模式，對死亡率下降原因的探討不能不是理解大陸人口轉變獨特性的內容。1949年以後，大陸社會相對安定，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以往曠日持久的戰爭對死亡率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1949年以後，特別是1949—1957年間，死亡率持續迅速下降與其說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毋寧說是制度因素帶來的醫療衛生技術的進步和普及以及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有利於死亡率下降的政策和措施。

就原有的制約大陸死亡率的因素而言，除戰爭外，主要有飢荒、癘疫、疾病、溺嬰、社會差別等因素^①。1949年以後的社會化過程使社會差別和溺嬰而造成的死亡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社會安定基礎上的經濟復甦，又使飢荒天災的影響得到減輕。在這方面，大躍進以後的三年自然災害使人口轉變過程非自然地抑止是一個例外。最為重要的是中共當局所推行的健康政策和醫療保健政策，這在世界性的「壽命革命」和醫療衛生技術普及的前提下成為有效地促使死亡率急遽下降的保證。一些原來



第二階段是大陸一段非正常時期，出生率猛跌，死亡率猛升。這一時期發生了所謂「大躍進」事件和嗣後的三年自然災害。

使人口大批死亡的瘟疫(霍亂、天花、瘧疾、血吸虫等)在1949年以後很快得到控制，不少已相繼絕迹^⑫。

出生率在滯後一段較長時期後的神速下降更為引人注目，被稱之為「人口學之謎」。探究這一「人口學之謎」的實質，是因為中國大陸的生育率轉變在沒有發生經濟「起飛」的條件下進行的。顯然在大陸生育率變化的決定因素中，人口政策的作用受到了特別的重視，甚至被認為是「促使生育率下降的決定性因素」^⑬。

在相同經濟狀況的發展中國家裏，人口控制政策常常難以有效推行，而計劃生育政策在大陸的出生率下降中居然異乎尋常的成功，究其原因，是與中國大陸社會的文化背景和政治結構分不開的。眾所周知，1949年以後中共建立起來的集權政治機制，在社會主義化過程中一次次地得到強化。正是這一機制使中共當局的人口生育政策得以強控性地貫徹和施

行：也正是這一機制演化了組織上一體化分層體制結構(從中央到地方，從城市到農村，從上層到基層)，從而保證了人口政策的有效施行。值得一提的是在政治體制下濃重的意識形態，更為保證人口政策的有效施行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⑭。長期來，在「政治掛帥」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前提下，作為中共號召的人口政策和其他政策一樣具有其速效性。

強調人口控制政策的決定作用，並不排除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這可以從地區間決定生育率變化因素的相關分析中得到驗證。蔣玉華對生育率決定因素的多元回歸相關分析表明，人均收入和文化教育是對中國大陸生育率影響最大的兩項社會經濟參數^⑮。尤雙林的相關分析結果表明，全大陸粗出生率與初中以上教育程度的相關係數為 $r=-0.55$ ，與人均產值的相關係數為 $r=-0.42$ 。在東部地區這種負相關程度更高，人均產值

計劃生育政策在大陸的出生率下降中居然異乎尋常的成功，究其原因，是與中國大陸社會的文化背景和政治結構分不開的。

(-0.87)、受教育程度(-0.83)、城市化(-0.50)等因素均與粗出生率有密切關係^{①6}。顧寶昌的地區相關分析表明，生活質量指數、婦女地位指數和有效避孕率與生育率的相關係數均在-0.7以上，路徑分析的結果也證實了這一點^{①7}。然而，必須指出，在大陸生育率變化過程中，由於人口政策干預的主導性，強控力量幾乎沖淡了其他社會經濟因素的作用，因而在總體上表現為社會經濟變量的影響相當微弱。

一方面是人口政策干預和社會經濟因素的合力促使生育率下降，另一方面是由人口政策所具有的行為性質所決定，它的干預會同時受到另一些社會經濟因素的制約。尤其是，對於像大陸這樣一個歷史悠久的傳統大國，人口政策在時間序列中的作用會受到削弱，這是大陸人口轉變模式中第四階段獨特性的終極因素。如前所述，1980年以來，大陸人口出生率出現了兩次回升(1980年和1986年)。對這兩次回升，國內外學者作出了眾說紛紜的解釋。但是，兩次回升最引人注意的是計劃生育政策問題。除去年齡結構的影響，兩次回升都與計劃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受阻是分不開的。1984年4月公佈的由中共批發的7號文件對「一孩政策」的執行採取了「開小口，清大口」的政策修訂，不能不說是這種阻力的顯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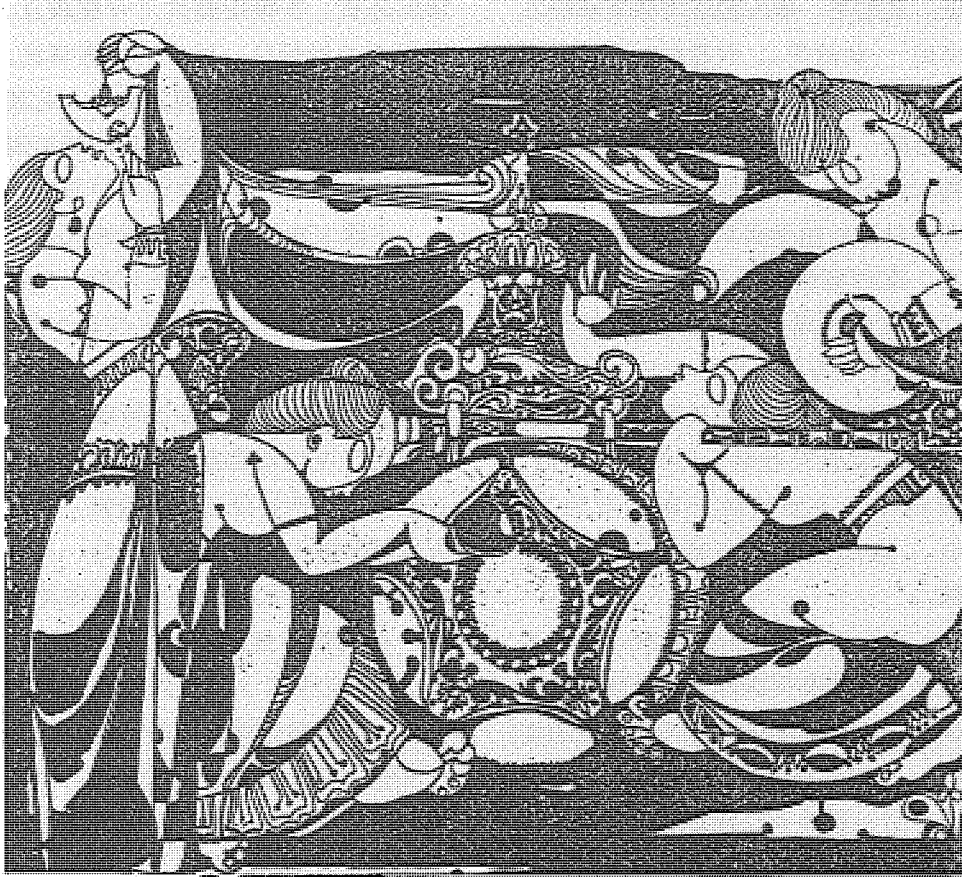
為甚麼中國大陸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至20%左右時不再下降，反而在80年代出現波動和返升呢？根本原因在於缺乏現代化基礎而產生的潛在阻滯力的顯性化，以及現代化過程中經濟社會大變革對人口政策施行的衝擊的結果。由傳統模式的轉變原因可以知道，人口轉變與現代化是相聯繫

的。在一些西歐國家，這一轉變是緩慢進行的，它發生在經濟「起飛」的現代化過程中。現代化大生產要求勞動者的科技文化水平不斷提高，勞動力再生產費用大大增加，少生少育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婦女廣泛參加生產、學習等社會活動，婦女生育率銳減。工業化和城市化程度越來越高，引發城市生活方式的普遍化和城市居民文化觀念的社會化和知識化。同時，消費構成不斷改變，夫婦的物質文化需要日益提高，社會保險事業不斷發展，孩子在家庭經濟需要體系中的地位降低，適應現代化生產條件的少生少育的生育觀被廣泛接受。醫療衛生水平提高，嬰兒死亡率大大下降，並使節育得到有效的保證，所有這些綜合作用的結果必然使宏觀人口發展趨向現代人口再生產類型，反映到微觀生育行為上，是生育意願的改變。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新加坡等國家為人口轉變提供了新的典範，其原因在於，經濟「起飛」的同時，對人口的生育行為加以干預，採取了控制人口增長的政策措施。因此，它們都幾乎隨着現代化的發展而完成了人口轉變過程。

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經濟有很大發展，但是這種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因為龐大的人口基數而「分母化」了。更為重要的是，大陸現代化結構變動遠未達到完成轉變階段。由於長時期以第一產業為主體，使經濟結構長期以來無法改變農村經濟和工業經濟的重輕格局。這種「二元經濟」結構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其他現代化結構的轉變。由產業結構所決定的城鄉結構狀況，使城市生活方式局限於小市鎮。佔人口絕對比重的鄉村，內部結構變

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經濟有很大發展，但是這種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因為龐大的人口基數而「分母化」了。更為重要的是，大陸現代化結構變動遠未達到完成轉變階段。



社會經濟大變革，影響着人口轉變過程。

動甚微。「城鄉二元」的這種差異，使社會化程度偏低。經濟狀況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文化結構狀況，而文化結構狀況，又反過來制約着經濟的發展。這種狀況一方面與較低的經濟水平相適應，對勞動力的需求還很大，客觀上刺激着傳統多生育思想的延續；另一方面受現代化思想的衝擊和同化作用僅局限於市鎮。

70年代大陸依賴強控性人口政策而進行的人口轉變，確曾在世界上造成了一種錯覺，即中國大陸是在沒有現代化基礎下完成人口轉變。由於沒有經濟上的根本「起飛」，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在一定時期裏迅速走向疲勢，並在一定適宜的「氣候」或時期產生反彈力量。換言之，人口政策的有效性依賴於其措施體系的強控性，這種強控性對於生育率來說只有暫時的抑制

作用，但沒有也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地摧毀高生育的基礎。固有生育基礎在大陸80年代新經濟變革的衝擊下日益構成對人口政策繼續推行的羈絆，雖然經濟變革大潮下的大陸人口政策愈益嚴格，措施體系愈益完善，也沒有停止生育行為的自然擴張。

80年代出生率的返升和經濟改革有着驚人的歷史耦合。在缺乏現代化基礎下受抑制的生育行為由於經濟改革的強化而引起的擴張是顯而易見的。1979年以後，農村經濟改革是以「包」到「家」「戶」為實質內容的。農民不再是單純的勞動者，同時也是獨立的生產經營者。他們的收入分配在上繳國家和集體提留以後全部歸自己支配。因而在目前勞動力密集型農業生產方式下，家庭人口和勞動力的增殖直接關係到家庭經濟收入和生活狀

況。其結果，納入到經濟發展戰略之中的「一孩政策」，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中農民近期經濟上迅速致富的目標相抵觸。與農民家庭生育需求變化直接相關的是，農村原有人口控制體制和手段難於適應變革，其作用不斷衰減。農村經濟改革使農村政社分開，基層政權形成人口控制上的「管理真空」，甚至出現了地方放任自流的現象。由改革而引起的戶籍制度職能的衰弱以及農村過剩人口的自由流動，則在另一方面成為計劃生育的「缺口」，造成大陸成百萬的「超生游擊隊」。

綜上所述，大陸80年代以來的人口生育率波動形成的人口轉變特殊階段，是由現階段大陸現代化進程決定的。由於大陸現代化尚處於初級階段，這一特殊人口轉變階段還將持續下去，直到高生育基礎被完全意義的現代化發展所摧毀。

結 論

人口轉變在工業發達國家被解釋為隨着工業化、現代化過程而出現的「自然而然」的過程。其生育率下降在死亡率下降以後經歷了一個「時滯」也「自然而然」地下降。生育率的下降當然也就被解釋為工業化、現代化瓜熟蒂落的產兒。然而，當視角轉到發展中國家時，許多學者仍在探究發達國家人口轉變的因素，結論也就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了。因此，直到現在，在汗牛充棟的有關人口轉變的文獻中，仍被認為「最令人驚異的方面大概是缺少一個一致可以接受的分析人口轉變的理論」。其原因，這些理論大都從某一角度或某一側面作出發點

加以分析，在特定條件下可能成立，但用之於規範某一國家的實際情況，卻往往難以取得相一致的見解。尤其是，幾乎沒有一種理論能夠說明不同地區或國家的人口轉變模式和原因。

中國大陸特種人口轉變模式為上述這一結論提供了經驗性佐證。無論是50、60年代死亡率率先持續下降，70年代生育率奇跡般下降，還是80年代的波動回升，能夠作出解釋的不是工業化、現代化因素的「自然而然」的過程，而是與制度有關的因素。中國大陸現階段人口問題的實質是，人口過程表現為龐大的人口基數再生產過程，它使得一方面，「人口壓迫生產力」在一定程度上對現代化產生阻滯力量，成為現代化發展的「瓶頸」；另一方面，旨在控制人口增長的人口政策的推行和實施，又受到現代化狀況的制約。只要這一現代化過程尚未完成，有效人口生育政策下的生育率只是得到短暫而強制性的抑制。在現代化程度尚低的中國大陸，幾千年封建社會沉澱下來的高生育基礎，會一直冥頑地表現自己，成為人口轉變過程中振蕩特徵的深層潛在因素。這種振蕩是現代化過程中經濟變革所難以趨避的。

在這種情形下，在戰略上應將人口納入現代化的軌道，既充分考慮制度性因素干預的有效性，又充分考慮人口與社會經濟因素共體相生的系統性。筆者認為，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在人口轉變過程中不得放鬆，稍一放鬆，可能使人口增長出現波動。另一方面，計劃生育政策須結合改革形勢的發展而不斷完善。更為重要的是，根據現實考察，包括政策因素在內的引起生育率變動的因素，主要是由社會經濟因素引發的：一方面現代化狀

大陸80年代以來的人口轉變特殊階段，是由現階段大陸現代化進程決定的。這一特殊人口轉變階段還將持續下去，直到高生育基礎被完全意義的現代化發展所摧毀。

況制約着人口轉變的程度，另一方面是現代化過程，即社會經濟大變革，影響着人口轉變過程。社會經濟因素與中國大陸人口的這種關係，使得它們成為大陸社會發展長期性的戰略問題。從這一戰略出發，極大的注意力應放在持久穩定地發展生產力，以工業化引發城市化的發展，從而進一步促進城市生活方式的普遍化和城市居民文化觀念的社會化和知識化。事實將表明，城市生活方式的普遍化，人均收入的提高，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婦女地位的提高，均有助於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的改變。

1992年8月第一次改稿於加拿大倫敦市
1993年2月定稿於香港

註釋

- ① 張純元等主編：《人口經濟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頁344。
- ② 起飛(The take-off)是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W.W. Rostow)提出的著名概念，意指在工業化初期的較短時間(20-30年)內實現基本經濟結構和生產方式上的劇變。人口學引用這一概念，並將它與出生率變動聯繫起來，認為二者是相互關聯的。
- ③ P.R.柯克斯：《人口學》(劍橋，1950)。
- ④ R.弗里德曼：《人類生育率社會學》(紐約：歐文頓出版社，1975)，頁35。
- ⑤ 安斯雷·寇爾：《人口學》，中國人民大學人口所情報資料室1981年3月譯出。本文引用資料摘自打印稿，頁95。
- ⑥ F.W.諾特斯坦：〈2000年世界人口〉，《美國統計協會雜誌》，第2期(1950年)，頁15。

- ⑦ 劉錚主編：《人口理論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頁105-7。
- ⑧ 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123。
- ⑨ 國民黨政府內政部編：《衛生統計》(1938)。
- ⑩ 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頁125。
- ⑪ 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頁109。
- ⑫ 朱國宏：〈中國人口死亡率下降的結構分析〉，《福建人口》，第2期(1987)，頁35。
- ⑬ 袁方等：〈新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和出生率下降的初步分析〉《控制人口與發展經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頁37。
- ⑭ 朱國宏：〈人口轉變論〉，《人口與經濟》，第2期(1989)，頁37。
- ⑮ 蔣玉華：〈社會經濟因素對中國生育率的影響〉，《人口研究》，第3期(1986)，頁30。
- ⑯ 尤雙林：〈若干人口與社會經濟特徵的地區差異模式及其對中國獨特的人口轉變的解釋作用〉，中國大陸全國中青年「人口與發展」討論會論文(1987)。
- ⑰ 顧寶昌：〈論社會經濟發展和計劃生育在我國生育率下降中的作用〉，《中國人口科學》，第2期(1987)，頁8。

程超澤 1951年生，上海市人。先後獲經濟學學士學位及地理學碩士學位，1992年獲加拿大安大略大學社會人口學博士。現任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從事當代中國大陸人口和經濟研究。曾在大陸、台灣、美國、聯合國等雜誌上發表近百篇有關大陸人口之論文。